

痛悼张光先生

张光先生是由临潼北上延安,又从延安南下的走一辈新闻工作者。他担任《陕西日报》总编辑期间,励精图治,致力改革,功劳卓著。

我早在《陕西日报》工作期间,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业务上的引领者。我钦佩他作为人民记者为百姓说话的责任感和平民化的文笔,素来以他为师长。张光先生待人亲若兄长、处事常有大气。在一次泮河游泳中曾救我于险境,我曾著文感恩。几十年中,每思及此便不由感动。

在去年省上春节团拜会上见到他,立即趋前问安,谈及青年时代的往事,分外亲切,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张光先生,一路走好!



肖云儒

惊悉《延河》杂志原主编、著名作家贺鸿钧(笔名贺抒玉)老师在中秋节前夕的9月10日仙逝,无比悲痛。本想前往吊唁,送老师最后一程,然而,拜读老师的最后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无谓抢救,让身体受罪,儿女受苦,医护受累,浪费国家钱财。妈妈年老多病,已经九十岁了。人总是要去的。要懂得爱惜你们自己,这才是妈妈最大的心愿。请你们记住以下内容:不接收花圈,花篮,挽联,挽帐,条幅,唁电,礼金等。也不要发讣告。不设灵堂,香烛,香案,不烧纸钱,放炮。一切亲人不戴孝。需要的话,家中只摆放鲜花。不用唁,不送别,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播放哀乐。也不要报道。只需亲属陪伴到最后。骨灰与你们父亲安放在一起……”我深感震撼,再一次为贺老师的清正人格、豁达胸襟与高风亮节所折服,只能含泪遥望南天,默默祈祷:敬爱的贺老师,一路走好啊!

扶文学后继, 像憨厚的父兄

我与李若冰、贺鸿钧老师相识,缘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玫瑰色的夜》时,去请李若冰老师撰写序言。敲开门,第一位接待我的就是贺鸿钧老师,她听完我的请求,像一位邻居大姐一样热情地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水,询问我的创作经历和收获。我一一作答后,她十分高兴地向我祝贺,说:“我读过老杜(杜鹏程)和韩思愈为你写序的《深沉的爱》,你的报告文学写得像小说一样,很有诗情画意呀!”随后,她唤醒正在小憩的李若冰老师,李老师满口答应。后来我才得知李老师当时正在整理自己的作品出版,十分繁忙。写好后,他还分别邮寄上海《文学报》和北京《文艺报》发表。虽然对我鼓励很大,但是给我写序言,对他整理自己的作品影响不小,让我十分愧疚……

1990年7月初,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省作协、陕西省文联和三原县委宣传部联袂要为我刚出版的新书《“囚犯”的苦恋》召开首发式和座谈会,我给时任省作协党组书记的李若冰老师送请柬,李老师看罢请柬和



1990年,作者与李若冰夫人、著名作家贺鸿钧合影。

我呈上的样书,高兴地说:“我一定按时参加!”贺老师也在一旁鼓励有加。两位老师扶持后辈的热情,让我永远铭记。

2002年3月9日,我的小说散文集《雾锁桃花塬》座谈会,在三原县举行。那天,时任陕西省文联主席的李若冰老师携时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的著名评论家肖云儒、时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兼陕西省评论家协会主席的著名评论家王愚、时任《小说评论》主编的著名评论家李星、时任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著名作家赵熙等风尘仆仆,前来参加我的新书座谈会。李若冰老师发言说:“吴树民是艺术上的多面手,艺术感觉非常灵敏,在我们省是非常有实力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朴素、真实、鲜活,有很强的感染力。”他和各位大家的发言,对我鼓舞很大。会后,我邀请他和参会文友们到于右任当年回乡十分喜欢

的明德享用餐。李若冰老师十分兴奋,一边用餐,一边继续探讨我的作品,不知不觉多饮了几杯,喝得十分尽兴,满面红光。次日上午,贺鸿钧老师打来电话,不无责备地说:“你李老师有糖尿病,你不该让他喝那么多酒,吃那么多八宝甜饭。”我不知道这些呀!急忙连连道歉……然而,贺老师对李老师的关爱呵护之情,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从此,这对文坛比翼鸟和我交谊渐深。

自强不息, 终成一代名家

陕北人常以“米脂婆姨绥德汉”而自豪,但更让陕北人自豪的是1928年出生于米脂书香门第的贺鸿钧,我认识她时,她已是誉满三秦的著名作家贺抒玉。她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韵。她的花季,有元米脂美人貂蝉那样娇艳绝代,我不敢妄加评判,可她的人品、文品,我敢断言貂蝉远不及其项背。上中学时,她的作文《我的妈妈》就得到鲁艺老师的赞赏,15岁就参加了绥德分区文工团,成了一朵吐香怒放的牡丹丹花。

关中人常以“三原桥、泾阳塔”而骄傲,但更让关中人骄傲的是1926年出生被卖给云阳镇杜家的虎娃,上世纪50年代就成了神州杰出的散文大家李若冰。

李若冰本姓刘,父母生有9子,他排行第5。因世道不平、家道艰难,3个孩子被父母卖掉,他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的生辰完全是自己猜度的。幸运的是养父母疼爱他,共产党更疼爱他。刚满12岁,他就参加了儿童抗战剧团,挂上了八路军臂章,不久,多才多艺的他当上了儿童团长。

在延安,经过在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和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虚龄18岁就成为党旗上一根纤维的他,又一头钻入文学的烟海

之中,他读鲁迅和“五四”时代作家的书籍,读《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读俄国文豪普希金、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凡在延安能寻到的文艺书刊,他都搜来阅读,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在延河畔,他多次看到负重跋涉的骆驼,心驰神往,于是,自起笔名沙驼铃。后来,不管是抗战胜利那年到中宣部工作,还是解放战争开始到一野四纵骑六师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工作,在战地办报,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清晨,还是在星光灿烂的深夜,他手中的笔总是不停地倾吐着对未来的憧憬,对人民的深情,对正义的赞颂。

“一唱雄鸡天下白”。望着欢庆新中国的礼花,他从部队转业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进修,得益于许多文学前辈,结识了许多文学朋友,看了许多中外名著,博览了许多

文史典籍,开始发表短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

1953年6月6日,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志趣,使他和贺抒玉在文学女神的撮合下结为比翼鸟。李若冰从中央文学研究所结业回到作协陕西分会不久,和野外地质勘探工作者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散文《陕北札记》之后,西出阳关,参加了甘肃酒泉石油地质大队的野外活动。翌年,跟随地质勘探者的队伍,第一次闯进柴达木盆地,还担任了勘探大队长。火热的生活,异域的风情,沙漠的浩瀚,使他文思如泉,笔底落珠,陆续发表了《勘探者的足迹》《在柴达木盆地》等10余篇散文。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同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6年,周恩来总理点名接见几位作家,李若冰是其中之一。周总理对李若冰说,你很年轻啊,希望你继续写出反映大西北地质工作者故事的好作品来。

柴达木,像聚宝盆似的吸引着 他。1957年,他第二次迎着戈壁风沙,闯进它的腹地,走一路,写一路。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柴达木手记》。

他刚刚告别西北的飞沙走石,又扑进东北的沃土密林;刚刚领略了祖国名山大川的壮丽,又去饱览江河湖海的雄浑。一篇篇特写、小说、散记、报告文学,像一只只报春的燕子,飞向各种报刊杂志,先后结集出版了《旅途集》《红色的道路》和《山、湖、草原》三本书。

笔耕不辍, 作品享誉文坛

贺抒玉17岁就和姐姐贺鸿训合写了秧歌剧《喂鸡》,经周扬推荐,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



《“囚犯”的苦恋》座谈会后合影,二排(左六)为李若冰老师

出版时由著名诗人贺敬之写了前言。

上世纪50年代,贺抒玉从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习归来不久,就出任《延河》副主编,乐为他人作嫁衣,经她编发的不少优秀作品,享誉文坛。

1965年,李若冰从大庆油田归来,想实现他心中向往已久的小说

中青年作家的崇高事业,沙里澄金,慧眼识文。听说延安大学一批学生在陕南一家工厂深入生活,写出作品,她便和女作家向彬(杜鹏程夫人)风尘仆仆赶到陕南大巴山深处,一篇一篇看稿子,一篇一篇谈意见。路遥的第一篇小说,是她从延川县的小报上发现,拿回来在刚刚复刊的《延河》上发表。平凹、忠实、亦夫、韩起、谷溪……一批批中青年作家的崛起,都融进了她的心血。为此,她获得编审职称,并于1988年荣获中国作协老编辑荣誉奖。

在工作之余,她笔耕不辍,一篇篇精美的小说、清雅 的散文脱颖而出,被评论界誉为“大西北文坛的一道彩虹,是陕北女性中的佼佼者”。她的小说《视察工作的时候》,被选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我的老师》被选入《全国儿童短篇小说选》;《红梅》被选入《1949-1979年短篇小说选》,并由外文版《中国文学》翻译向世界介绍。近年来,她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山路弯弯》《女友集》和散文集《琴姐集》《多情,人情》。

李若冰、贺抒玉相濡以沫已43年了。这对心心相印的文坛比翼鸟,生活上默契,抱负上通达,创作上出新。他们共同献给读者的散文集,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爱的渴望》,字里行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对普通劳动者的深情,也奔涌着他们之间爱的激流!

而今,这对令人敬仰的文坛比翼鸟,又相聚在遥远的天国……□吴树民

■人物春秋



2002年3月9日,作者与陕西省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李若冰(中)、陕西省评论家协会主席王愚(右二)、著名评论家肖云儒(左二)、李星(左一)在《雾锁桃花塬》座谈会后合影。

晚明士人的旅游消费观

一块民国时期的墓志碑

一口水井,它在陕西洛南石门镇街道背后的村子里。

这口水井什么时候打的,具体时间没有人知道。问及附近的村民,他们说,这口水井年龄可大了。

从刚修缮的井沿、磨光的轱辘柄,可以看出它的沧桑。磨得光滑的轱辘柄,摇出一个又一个故事。

这口水井养育了多少代人,谁也不清楚。在当今有了自来水的年代,这口井仍然在发挥着着自己的作用,每天仍然有村民来井边打水。

我在这口水井边发现了一块民国时期的墓志碑。碑额和碑身被打破,并且分离,碑身还被凿了一个圆头,用做穿轱辘的长杆。碑头放在旁边,新的碑头是用水泥和砖块新叠加的。碑身下面的基座用水泥和石块固定起来。

从石碑残缺不全的遗留内容看,墓志的主人姓马,名兴义,字宜生。碑文中主要对其生平及事迹、为人、处事、德惠等做了简要介绍,还有立碑人的姓名等内容。

目前能看到的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字样,以及落款对主人的解释“北平民国大学毕业现任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略阳县党支部书记方行政幹(干)部训练所毕业”。

或许主人就是洛南石门人,在他去世时,后人 为他立了这块墓志碑。从碑石的内容可以推测,这或许是一个与洛南有关的民国时期名人,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为略阳县党支部书记,有可能为新中国的成立作过贡献。或许从这块碑石,可以解释洛南石门解放前的一些历史故事、文化变迁等方面的历史内容。

这块墓志碑怎么到水井边,用来压轱辘柄,应该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另外这块墓志碑的主人是否在洛南县的县志有记载,不可而知。 □岳红记



晚明旅游之风盛行,西湖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作为一个“都市文人”,张岱有关西湖的作品多达76篇。对于他而言,西湖不仅仅是一泊湖水,更是一生岁月的留影。以《西湖梦寻》为代表的西湖小品文是张岱“留之后世以西湖之影”。纵观张岱的西湖小品文,多描写西湖旅游消费的繁华热闹场景和游客们的旅游娱乐活动,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盎然的情韵。旅游服务形态的产业化、旅游消费观念的奢侈化以及西湖旅游的节庆化是张岱西湖小品文对晚明西湖旅游书写的三个重要内容。

明中晚期商贾经济发达,杭城市民崇尚弃儒经商、弃农就贾之风。市民群体开始关注商机,创造新的工商行业,特别是围绕西湖旅游大做文章。此时,杭州以西湖为中心的旅游产业再度兴起,其从业者大多为杭州市民。这些市民作为一个城市群体,主要有西湖轿夫、船夫、戏子和小商小贩。后世人们开始关注西湖旅游从业者,重评其价值并注重其生存权利:“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利于此辈也。”

西湖旅游群体的出现和旅游服务这个新行业的兴起,源自于市民需求。中晚明时期西湖的重修和景点恢复,使西湖重新出现了大量游客,游客带着多重的游玩需求而来。市民群体在西湖的聚集,给西湖带来了大量的游人群体,从而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大量的商

机和生存的希望。如七月半时,西湖之上“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到西湖香市时,就算是杭城内,也是“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这为旅游从业者提供了大量的从业机会。

西湖红船为游览西湖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商业和娱乐服务。西湖红船,实质是指西湖上的小商小贩。这些船“酒棹游湖,往来交互,歌吹之声相间,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无日而息也,其盛矣哉”。这些红船还为游湖者献技献艺,她们都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的享乐而产生的城市旅游从业者。随着西湖旅游的发展,西湖边也出现了大量戏班,供游人和城市人欣赏戏曲。

明中叶以后“崇奢黜俭”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消费方式和观念的重要转折。西湖自南宋起,就已经有着“销金锅”的说法了。郎瑛《七修类稿》云:“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杭州文人还以西湖享乐作为城市象征和骄傲。西湖周围的豪华住宅,也是城市享乐消费方式之一。在西湖边置宅,成为杭城人追求享乐生活的标志。西湖边私人宅院林立,多以豪华精巧著称。文士更重视宅院,其理想的宅院还要能“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文人士大夫广建园林和别墅,以至出现大量“城市山林”。

西湖游船的精美和讲究,更能体现西湖的享乐消费方式。城市文士和市民最爱泛舟西湖,“钱塘士女春可怜,年年争泛木兰船”。文人以此作为理想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千金卖一舟,舟中

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明代西湖游船装饰精美,船体趋向简朴小巧,看重门窗敞敞,便于倚眺湖景。这类船,其色彩和镀金形式,奇特而且多样化,航行设备很完善,不致遭受水淹。

这种奢靡之风的兴起,主要原因是城市经济繁荣、商品交换发达、城市化进程加快。“崇奢黜俭”思想的出现,促进了旅游消费领域奢侈之风兴盛。可以肯定的是,旅游奢侈之风实质是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乐,是社会阶层尤其是市民阶层对物欲天然性的认同,促使文人趋向于对都市世俗生活的热衷,体现出市民社会的趣味。

西湖作为杭州城市的象征,作为文士、市民生活的重要场所,承载着独特的宗教民俗和节日民俗。西湖旅游的节庆化主要表现在西湖香市和龙舟竞渡上。

西湖香市是杭州信仰民俗与城市商业结合的产物。明代杭州香市开市时间很长,“起于花朝,终于端午”,历时数月之久,其范围也不断扩大。香市的形成,缘于进香参佛的香客数量之众。每到花朝时节,来自苏嘉湖诸府甚至山东的香客云集西湖。运河和西湖到处是船,客棧家家住满。以进香为名、游玩为实的市民和文士不在少数,这让城市里的小商小贩发现了无限的商机。佛寺或西湖景点,逐渐出现了小货摊,直至后来百货聚集。香市百货聚集,自然吸引大量香客前来购物。西湖香市在西湖地域和杭城都市生活中产生,是明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宗教民俗新变。

西湖端午竞渡在唐代是在钱塘江举行;到了宋时,杭州的官员则把竞渡引到西湖之中;到明代,西湖成为竞渡的主要场所。西湖竞渡,是杭城端午的典型习俗。因以西湖为竞渡场所显得有些狭小,所以西湖竞渡还具有表演和娱乐功能,吸引了大量文士和市民前来观看。张岱说,正值盛夏,观竞渡的杭城人倾城而出,“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人胜”。观竞渡者主要集中在断桥和苏堤之间,“自断桥至苏堤一望,连袂落鸳鸯之雨,招摇成燕子之风。周姬绮生,正抛雏蛋,欲控玉骢驰骤”。文人不仅关注竞渡民俗活动,还关注整个西湖的热闹场景,他们可以饮酒、观渡、观人。

张岱小品文对西湖旅游消费文化的书写,展示了晚明文士的旅游观是一种具有功利色彩的实用主义。这种观念使得传统文人的旅游活动的价值取向由道德取向转变为工具取向,推动了西湖旅游活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对西湖旅游盛况的描写,显示了当时西湖周边新兴旅游阶层和旅游从业人员 的崛起;对风尚奢靡的消费旅游观的书写,颠覆了以往的消费观念,说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消费观念、从业方式、人生情趣等文化价值观的嬗变。这些变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一些破坏,标志着市民阶层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当时的旅游风尚添加了新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趣味。

□王丽

■钩沉